

简帛《五行经》释解



熊春锦



中央

简帛《五行经》释解

熊春锦



中央编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帛五行经释解 / 熊春锦著. — 北京 :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6.1

ISBN 978-7-5117-2913-2

I. ①简… II. ①熊… III. ①五行—研究 IV. ①B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310022号

简帛五行经释解

出版人: 刘明清

出版统筹: 董巍

责任编辑: 曲建文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址: 北京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5号鸿儒大厦B(100044)

电话: (010) 52612345 (总编室) (010) 52612363 (编辑室)
(010) 52612316 (发行部) (010) 52612315 (网络销售)
(010) 52612346 (馆配部) (010) 66509618 (读者服务部)

传真: (010) 6654583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宏伟双华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字数: 100千字

印张: 7

版次: 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定价: 33.00元

网址: www.cctphome.com 邮箱: cctp@cctphome.com

新浪微博: @中央编译出版社 微信: 中央编译出版社(ID: cctphome)

淘宝网店: 编译出版社书店(<http://shop108367160.taobao.com/>)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吴栾赵阎律师事务所律师 闫军 梁勤

凡有印装质量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电话: (010) 66509618

序

在当前的世界文化格局下，作为正在重新确立文化软实力的中华民族，对于本民族传统文化的研究，急需建立自己本身的话语体系。这一体系当然要尽可能地吸收世界文化的优秀成分，但是主导的思想观念、研究的方法路径、学术分野以及术语的创制等，都应当由中华民族基因文化的母体孕育而出。只有这样，我们构建的文化体系才具备挺立于世的脊梁和丰满健实的血肉。

熊春锦先生新著《简帛〈五行经〉释解》，独到之处正是体现在构成话语体系的这些要素上。

首先，是本书立足于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原生态基因文化，来研究简帛《五行》的原生态，主导思想来自于伏羲所创立的易道文化，黄帝所创立的法道文化，老子所创立的德道文化。熊先生早在九年前发表《中华国学道德根》这部哲学专著时就提出，伏羲、黄帝、老子这三位古圣的思想一脉相承，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庞大基因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文化。熊先生对于《五行》的研究，正是基于这一学术观点之上，而做的具体且深化的论证和解析。论证的关键，是超越狭隘的伦理范畴来认识中华文化源头上“德”的本义，还归中华民族天人合一的文化理念。如本书第二部分中所论述的：“道是虚无而生万有，德是虚无而养万物。德是一，

德朴散开来一即化为五，成为仁、义、礼、智、信五大子系统，既称之为五德，又称其为五常。‘德一’能量在天处于质象时称为五德，进入物相后即称为五常，仍然是五德物化成五气能量，五行之‘五’的本质是“德一”的分化和畜养分类。”从这一论述出发，我们重新观察历史上各家所言的德与行，就不难发现文化源流之端倪，以及文化基因丢失之痕迹。

“‘运’，是指能量的传输运动变化。因此，五行的本质是五德能量的运动与变化，五运则是五德能量运行的周期律。”本书通过对“五运”和“五行”的内涵进行进一步分析后提出：“五行学说思想并不是儒学所创，而是伏羲易道、黄帝法道、老子德道文化中修身文化教育的基础理论和方法。阴阳与五行这两大学说，是道德根文化的核心基础理论。”

现代有学者曾经总结说，在当代可以看到三个传统，即道家的道治，儒家的德治，法家的法治。儒家德治的根本目标是孔子所言的“据于道”；法治从根本上而言，也是根据天道的规则来制定人为的规则，以便于通过法的方式去归本。也有学者认为，熊先生的研究虽然以道为主，但所提之说实际是贯通三者的融贯之学，之所以能如此，是因为熊先生把中华文明的起点向更根的基础上做了推进。参考这些学者的观点，再来理解熊先生对于五行学说的定位，我们的认识会更进一层。这种前进，很有可能使我们在对于民族母体文化的认识上，开辟一重崭新的境界。

第二，本书不仅运用了两千年以来文史研究的传统方法，借助语言学、训诂学、考据学、史料学、考古学、文学、经学等多种工具，来释解《五行》的文辞和义理内涵；更重要的是，熊先生作为中华传统修身明德文化的力行者 and 传播者，敏锐地发现了《五行》之思想和方法论，在道德修身文化体系中拥有的位置和价值，从而在研究路径上开辟出实践出真知的一脉。

熊先生在展开文化研究之初，就对东西方的文化特质作出了东方“内求法”诞生内文明与西方“外求法”诞生外文明的分野，其中的分水岭就在于修身明德的内求实践。根据对东西方文化的对比研究，熊先生提出，修身内求是人类文化的共同起点。只是在度过了文化的摇篮期后，西方的根文化发生了断裂，内求法丢失，只剩单纯的外求法；东方中华、印度等民族，因为不同程度地保留下内求法的传承，故而诞生了由内文明指导外文明的东方文明和文化。这其中，中国的内求法保留最为完整，内文明时期的文化成果在历史上虽然几经削伐坑黜，但血脉传承始终维系，因而支撑了民族命脉的延续。也正因为如此，虽然两千年来坚持修身内求实证的研究者越来越少，但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内修德性、外修德行的观念，却始终未被国人抛弃。

回顾清末以降的历史文化研究历程，我们不难发现一代代研究者对于突破研究路径的艰辛探索和强烈渴求。从近代

“用汉儒之训故以说经”¹到“益得皮附科学，托外援以自张壁垒”²，到“不立一真，惟穷流变”³等等，都是学者们为了尽可能追溯历史文化原貌，而从不同角度所做的积极探索，也积累了宝贵的研究成果。然而，之所以众说纷纭，甚至于不同学派之间割席而坐，的确是缘于文化的变迁，使得后人即使拥有王国维所云的史料和文物二重证据，还原历史也并非易事，解读出经典的原生态面貌更难如愿以偿。现代学人中有年轻一辈，在历史文化研究中尝试通过跳出自我来审视人心的途径，在二重证据之外，加入类似第三方视角，来解读证据之外的潜台词。种种尝试，莫不说明，突破两年来的文化形态所能够提供的研究路径，是我们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制约的出路所在。

然而，当代文化研究的路径要想重新回到修身明德的正途，还需要跨过重重障碍。其中最大的障碍，来自于将“德”囚禁于伦理范畴的观念藩篱。简帛《五行》的面世，恰好为我们越过这道藩篱提供了非常珍贵的工具。因为《五行》所论，正是德之行五的原理和实现“德之行”的四大修身内求方法论。因此，熊先生提出：“目、喻、譬、幾四大方法论，是东方文化‘内求法’的文化基因，是基因文化的核心元素，这四大方法论，如同西方文化‘外求法’通过常道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和超常之法的‘直觉灵感’，

1 刘师培：《近代汉学变迁论》，《国粹学报》第31期，1907年。

2 《国学文选类纂·总序》，《钱基博学术论著选》，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

3 顾颉刚：《答李玄伯先生》，《现代评论》第一卷第10期，1925年。

建构成西方文化特征的科学体系。西方是以‘科学’为体系进行研究发展，东方在基因文化时期（德道根文化时期）则是以‘幾学’为体系统进行研究发展……东方古代的中国则是以修身内求法建立天人合一的系统方法论，目析法、喻析法、譬析法这三种方法论既是有为方法论，同时也是内外兼论，既包含着逻辑推理，又跨越着逻辑推理的局限性。而幾析法则更是完全超越直觉与灵感的性识方法论和慧识方法论，要求全面摆脱后天意识行为的束缚，从有为迈步入无为中认知事物，因而实验证伪的重复性极大地降低，资源损耗低下，人与自然易于和谐。”

也正是据于研究路径上的差异，熊先生通过对帛书版与竹简版的对比分析，得出论断：“楚简《五行经》应当是道学修身基础理论的原生态，诞生的时代应当处于周朝的初期或是更早的时期，而帛书《五行》则是春秋战国时期百家争鸣过程中经儒学编修以后的版本。”“楚简《五行经》，是黄老德道文化系统中十分珍贵的一部修身明德求真的基础理论‘教材’课本。”

第三，熊先生对于《五行》的释解，并非孤立的研究，而是生长于历经二十年的拓荒耕耘，已经春华绽放的“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研究园圃。这个园圃内，从思想灵魂到学术架构，从研究工具到概念术语，都已经呈现出一个完整体系的构形。

将基于修身明德内求的研究成果与传统中医学、现代物理

学、生理学、心理学、教育学、哲学等领域的前沿成果相结合，用现代语境表述中华文化中最久远的天人合一内容，这是熊先生致力构建“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体系之初，就确立的学术培育和创新机制。正因为源出于根文化之母体，因而新的话语体系中，学问的种类与层级的产生，也是如树木开枝散叶的过程一般自然发芽开花，一些较早生出的干枝上已经结出累累果实。仅从历史和文化的根、干、枝看，即已有非常丰富的概念系统，如：文明分类上，有内文明、外文明之分野；文化实践路径上，有内求法、外求法之不同；文化定位上，有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之和伏羲易道文化、黄帝法道文化、老子德道文化命名；历史分期上，有大道文化时期、德道文化时期、道德文化时期之层级；文化形态上，以修身生理学为依据，区分了中国文字中“愬”与“哲”的本质区别，将文化发展分为性识哲学文化、慧识哲学文化、智识哲学文化、意识哲学文化四种主要形态；世界观上，将传统文化领域对“物”与“质”的界定，加以科学化表述，有物相境（也称欲相境）、色象境、无色境之层级；实践领域上，有“常道”与“非恒道”之别；方法论上，有一元四素方法论、三因论、三元论，等等。本书对于《五行》的释解，又使方法论系统中增加了“幾学”这一从远古而重新复活的概念。这些名目，如果我们熟悉历史，会发现它们的源流所出；如果我们同时了解当代世界文化的发展，还会发现它们的新意所在。对于《五行》的研究，正是“愬学”这根树干上新结出的一颗果实。

数十年前，曾经有历史学家发出过慨叹：现在中外学者谈汉学，不是说巴黎如何，就是说西京（日本东都）如何，没有提中国的，我们应当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¹这一慨叹与我们今天对提升民族文化软实力的反思，仍有许多相似。反思历史原因，关键的转折点在汉代。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纷纭五百年，司马谈最终总结归为六家：阴阳、儒、墨、名、法、道。六家虽因历史的风云际会而各表一支，但都是有根基之学，而非无根之木。一些学说中虽然已经不能正确解读修身明德文化的核心内容，但是对于各自继承的部分文化并未做破坏性的颠覆。唯独汉代“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将修身内求的基因从孔孟原儒的思想中抽离得最为彻底，使这一历史阶段成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因此，熊先生在本书中阐明：“对秦汉时期所形成的道德文化系统，我们加以研究以后，就不难发现意识哲学文化对道德文化的定义，不论是在五行的定位上，还是在善道与德道的选取中，都是明显具有‘仁义礼智四行全，善道也’的特征，‘四行和，谓之善。善，人道也’的常道层级十分明确，并未进入‘非恒道’的德道境地内；虽然在言五行之信，但是却并未上升至‘聖型於内，胃之德(惠)之行’的次第和层级之中。而且，秦汉以后的道德文化主流是改良儒学所独尊把控的，五行型于内几乎全都丢失，仅存五行行之于

1 郑天挺：《回忆陈援庵先生四事——致刘乃和同志书》，《陈垣校长诞生百年文集》，1980年。

外。迷失于五行的表象中，就只能产生善道的效果。”

《五行》因出土时间晚，虽然引起了世界汉学界高度重视，但国内学术界的研究并不落后，这是非常值得欣慰的。但是由于《五行》内容的特殊性，它在文化话语权上可能产生的价值并未被发掘出来。《五行》的研究与中华大地上传统文化的复兴一样，都到了需要归根的历史节点。老子曰，归根，才能复命。只有立身于中华文化的道德根系之上，各家学说才能真正完成自己的历史使命；只有与原生态的文化合为一体，我们对《五行》所做的各种研究探索，其中的优秀部分才能愈加光彩亮丽；其中的误区也才能让后人得到明确的警醒和提示。

正如《五行》所言：“五行皆型于内而时行之，胃之君[子]。士又志于君子之道胃之时（志）士。”做人修身明德如此；治学立文亦如此。本书的面世，正属于民族文化话语体系建立过程中“五行皆型于内而时行之”的开拓性实践和创造。对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而言，不仅可以通过本书而追根溯源，一睹中华道德根文化核心基础理论之一的五行学说的本来面貌；更重要的是，可以借助本书对五德五行内涵的揭示，把握修身明德理论的宏观系统，指导自己拨开重重迷雾，在修身明德实践的道路上迎来柳暗花明的新天地。

编者

2015年12月

凡 例

一、本书对楚地出土战国简册《五行》进行释解，同时与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进行版本对照。

二、在前言部分简要介绍简册《五行》的发现、整理情况，书后附有参考文献。

三、楚简《五行》以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为主体底本，兼顾文物出版社2011年出版的《楚地出土战国简册合集（一）》。根据楚简书写中自带的分段符■进行分段，标点与底本有所不同。

四、为便于阅读，异体字、假借字随文注出通行字，写在（ ）内。经专家研究确认的错字，随文注出正确的字，写在<>里。根据残画和文意可以确认的字，写在【 】里。根据文意或他本可以确切补出的缺文，也写在【 】里。笔画不清或者已经残去的字，用□号表示，一个□代表一个字。个别无法确定的字，用简文图片表示。

五、由于汉字在演变的过程中，字形和字义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使用一些今体字对概念进行界定时，会产生本质上的偏离，故本书释解部分使用了个别古体字或繁体字来定义关键概念。例如，在定义上古天人合一的文化时，使用“哲学”，而不使用“哲学”；在表达人体内器官组织时，使用“臟”，而不使用“脏”；区分了“執”与

“艺”，“幾”与“几”的内涵等。对个别字进行了还原处理，如将“其”还原为“亅”。

前 言

古佚书《五行》篇在二十世纪末曾两次出土，首次是一九七三年十二月长沙马王堆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在湖北、河南、湖南省境内，出土了大量战国时代的竹简，因为这些地域在先秦时属于楚国故地，故这些竹简被称为“楚简”。其中，一九九三年十月在湖北省荆门市郭店一号楚墓M1发掘出的804枚竹简中，有50枚竹简上的内容与长沙马王堆第三号汉墓出土的帛书《五行》篇相近，经专家考证，确认为另一个版本的《五行》篇。

楚简《五行》全篇现存1144字，分章符号27个，与帛书本的“经”大体相同，而无帛书本的“说”。中间有一部分内容的次序与帛书版本有较大不同。湖北省荆门市博物馆在《荆门郭店一号楚墓》报告中指出，郭店M1具有战国中期偏晚的特点，其下葬年代当在公元前4世纪中期至前3世纪初。

两种版本《五行》的先后面世，在海内外学术界掀起了持久的研究热潮。在众多的研究成果中，不论是对于帛书的《五行》版本，还是楚简的《五行》版本，社会上多见于站在儒学观念上的释读或者考证推论之说，有重伦理者，有谈养生者，而从道学修身明德实践角度进行释读的，则比较罕见。

《五行》到底是一部什么样的经典？它的原生态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原生态，有什么渊源？它的诞生时间，是否可以

作出大致的推论？《五行》中的思想理论和方法论，对于中华传统文化复兴有无指导和应用价值？本书站在道学修身明德实践的学术思想上，立足于对文化基因的把握，在基因文化的角度上进行分析，对简帛《五行》进行了对比研究，并重点对楚简《五行》进行了释解，对上述问题进行了解答。

本书第一部分为简帛两种版本的比对，重点以1998年文物出版社出版的《郭店楚墓竹简》中的《五行经》为主体底本进行解读；同时，罗列2014年中华书局发行的《长沙马王堆汉墓简帛集成》中的《五行》释文，重点保留了【经】的部分，方便读者自行阅读、参考。

第二部分，对“楚简《五行》优于帛书《五行》”进行了学术论证，指出楚简《五行》的原生态，是黄老德道文化系统中十分珍贵的修身明德求真基础理论“教材”，属于大道文化基因的组成部分，是德道文化类的基因文化，具有重要价值；依据“论大道之文为经”的原则，做了《五行经》定名论证。

第三部分，将楚简《五行经》视为修身明德基础理论指导教材，德道文化修身的必修课件进行分析；依照德道修身之理而作了系统释解，而不作空泛的学术是非考证。特别是对于《五行经》中提出的“目、喻、譬、幾”四析法，进行了深入的解读，将东方华夏基因文化中修身内求法的四大方法论大白于世。

由于本书的释解是建立在“中华传统道德根文化”这一

研究体系之上，因而运用了一些有特色的概念术语。为了便于读者理解，我们对于与理解文义密切相关的概念，用页下注形式在正文的下方进行了标注；对于有助于掌握文化体系的概念，在结语之后，单列了术语介绍。

一部经典穿越数千年流传至今，唯有尽可能地恢复其原生态面貌，才能使之在当今时代发挥更大的价值。诚愿本书对广大传统文化爱好者理解中华民族的道德文化、五行学说以及修身明德方法论，有所助益。

目 录

序	I
凡例	IX
前言	XI
第一部分 简帛五行经文对照	1
第二部分 五行归正综述【综整】	23
1. 楚简五行优于帛书五行	24
2. 楚简五行的重要价值	24
3. 释读楚简五行的立足点	26
4. 五行的本义和历史演绎	27
第三部分 经文释解	35
第四部分 结语	173
术语介绍	181
后记	193
参考文献	197